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曾国藩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曾国藩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 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了大量努力，争

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曾国藩简历

一、青少时代

二、建团建军

三、镇压起义

四、两江总督

五、攻陷天京

六、“剿捻”失败

七、最后三年

一、青少时代

1881年(清嘉庆十五年)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有名的刽子手,被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湖南衡阳,世代务农,清初始迁至湘乡,传到他的五世祖时,已成为颇有产业的地主,但并“不显于世”。曾国藩后来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乃是事实。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本是浪荡子弟,“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几乎搞掉了家产。在长辈的讥笑声中,他才结束了浪荡生活,天天督促长工,凿石决壤,变小人读书做官,虽然有钱,社会地位仍不会太高。曾玉屏“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耻什么?就是缺少名望。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后代,决心让后代发奋读书,遵循封建时代由科举而做官的正途。

曾国藩的父亲名麟书,字竹亭,自幼读书。曾玉屏虽严加

督责,但在子曰诗云方面,却不能给儿子以任何帮助。曾麟书十几岁开始应童子试,一连考了十七场,到四十三岁两鬓已经斑白,才补了县学生员,成为一名老秀才。

靠曾麟书科举登仕、光耀门庭是不行了,曾玉屏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曾麟书生五子四女,曾国藩是他的大儿子。依次是:国潢,字澄侯;国华,字温甫;国荃,字沅浦;国葆,字事恒。五人性情、气质很不相同,曾玉屏最中意的是长孙曾国藩。

曾国藩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曾麟书毕竟读了一些书,略识科举考试的蹊径。这对曾国藩的教养,比起曾玉屏对于自己,无疑是有助益的。在曾麟书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第二年,他的弟弟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作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照朱熹的解释,写了出来。他的祖父乐哈哈地称赞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1826年(道光六年),曾国藩十六岁,去应长沙府试,名列第七。1834年,二十四岁,肄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理学家朱熹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这年,他参加乡试,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年底,入都参加会试。

曾国藩在北京,住长沙郡馆。1835年(道光十五年),会试不售,第二年会试,再报罢。两次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途经金陵(今南京)时,他把借得的路费大部分用来

购书，“归而诵习益勤”。如此苦读了两年，他的八股、制艺便大有长进。1838年，再入都会试，中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殿试，列三甲第四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最后朝考，列一等第三名，拔置第二名。因为成绩优良，便选入翰林院的庶常馆深造，当了庶吉士。他从此更名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

清朝制度，庶吉士还得学习三年，经过考试，成绩好的，授以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列各部任主事或外放知县。不管怎样，官是做稳了。二十余年寒窗苦读，总算有了出头之日。这年秋天，曾国藩便踌躇满志地起程回家。曾家世代代，只有曾国藩第一个点了翰林，他的祖父因此大宴宾客，十分热闹。

在封建社会中，为了表示家族的源远流长和名门显宦的历史，凡有社会地位的人家，多修有家谱。曾家世代“微薄”，没有家谱。现在不同了，曾国藩入翰林发了迹，当然得修谱牒。于是，曾国藩风尘仆仆地在以衡阳为中心的几个县里奔波，南到耒阳、永兴、清泉，西北至邵阳、武冈、新化、安化，“议修谱牒，清查源流”，忙了大半年时间。

这年冬天，曾国藩赴京，在庶常馆继续进修。

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登入仕途。这是他的生活、思想的一个转折。以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制艺，以图科举；此后直到组织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对武装，首尾十年，完全究心于诗古文辞、宋明理学，把自己修养成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道学家。

道学，又称理学，是封建时代的儒家哲学思想，以继承孔

孟道统、阐释儒家经典的义理性命之学为主，故有此称。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历明、清盛行不衰，统治者希图以儒学道统来卫护封建君统。所谓“道统”，指儒家传道的统绪，唐朝韩愈首先正式提出此说。他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是一脉相承的传授儒术的正统，自己则隐然以遥承孟子自居。宋代朱熹则摈弃韩愈，以周敦颐、程颐和程颐上承孟子，自己又接周、程。明、清之际的孙夏峰，又在朱熹后面加上陆象山、王阳明，这就是所谓的儒学道统。儒学道统是封建君统在学术上的投影，也是君主专制的护符。为此，清朝统治者对道学大力提倡和支持。康熙皇帝命人撰写《性理大全》，编纂《朱子全书》。他的子孙们又把理学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著作，定为士子必读书和科举考试命题、判卷的依据。

曾国藩是在科举道路上一步步爬上官位的，所以他在做官以前，早已接触到道学；不过那时主要用心于制艺八股，把这当做敲门砖，用以敲叩科举之门；对于理学的全部奥蕴，还来不及穷究消化。叩开科举大门以后，他才潜心探究此中奥秘。十来年中，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王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

还在1835年，第一次会试不售，留寓京师读书之时，曾国藩便已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以后，他又仔细研究韩愈思想、学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思想颇受韩愈影响。对于韩愈宣扬封建道统的《原道》篇，更是十分推崇，认为孔、

孟以来“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寥寥可数的好文章之一。韩愈在《原性》篇中，继承董仲舒性三品说，把人性分做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和下品是不可改变的，但“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可按封建的道德来改造中品的人性。曾国藩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合……韩公之言固无失耳。”韩愈是一个维护封建君统的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与柳宗元一起，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崇尚质朴，反对柔靡文风，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散文。曾国藩曾受到韩愈维护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其优秀文风的熏陶，“慨然思躅而从之”。他日后在日记、书信中，常常谈到韩愈的文章，称赞它“意义层出，笔仗雄拔”，流露出无限倾慕之情。

从韩愈到朱熹，本是一脉相通的。曾国藩推崇韩愈道学，自然就会走向程、朱理学。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记载，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1842年，“公益致力程、朱之学”。以后，他不但致力研究，而且力图以理学作为自己修身行事的准则。1844年，曾国藩“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谨言，五曰有恒”。就完全是理学家修身养性的一套。

曾国藩踏上仕途就崇奉理学，除了地位变化这一原因之外，当时也受到一批研究心理学的师友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原因。

唐鉴最早诱导曾国藩致力理学。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史称他“生平学宗朱子，笃信谨守，无稍依违”。1841年八

月，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向他请教，他说：“当前《朱子全书》为宗。”从此，曾国藩便“以朱子之书为日课。”这个时期，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或月一至，或再三至，”以师礼事之。唐也很赏识曾，后来撰辑《学案小识》，便请曾国藩校刻。

大学士倭仁，是曾国藩钦敬的另一前辈理学家。倭仁，蒙古正红旗人，字艮峰。据说他“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作、饮食，皆为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曾国藩向他请教，他告诉曾国藩“好问”、“好察”最要紧。曾国藩日后时以“痛自刻责”自勉，可能与倭仁的影响有关。

与曾国藩一道研讨理学的，还有同乡好友刘蓉、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仁和邵懿辰等等，都是当时被称为“绩学之士”的人物。

理学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产物。自北宋产生，发展到南宋，就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一派是以陆象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明代王阳明又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两派都以维护封建三纲五常为核心。到了清代，随着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理学也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这不仅表现在清代进步思想家戴震等人对理学的尖锐批判，更表现在理学已陷于僵化的泥坑，而无新的发展。曾国藩主要崇奉朱熹一派，他和理学师友只是勉强守护住藩篱，所发议论，也多是重复或阐述朱熹等人的余唾。

其余，在人性问题上，他有时直接引用孟子“人性本善”的

命题,同时,也采取程朱“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来作补充。他认为,纯善的天理之性或义理之性充塞天地,圣人、常人的秉性都是一样的善。只是圣人不但得其全,而且他的气质又最清、最厚,又没受到什么习染,所以他最能体现、实践封建的仁义道德,尽人的天性;常人却恰恰相反。而气质的清、浊、厚、薄决定了人是圣人还是常人。气质又是先天禀赋的。归根到底,圣贤智愚,都是先天决定的。不过,只要“格物诚意”,即通过学习修养,便仍然能恢复人的善性,体现人的天性,为圣为贤。

当然,曾国藩的理学也不完全是前儒学说的复写。他的理学也带有时代的印记。

清代一些理学家,把王阳明主张“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即心学,与明朝的覆亡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亟主抛弃空疏的心学。其中,桐城派理学家更把这种思想,和他们倡导的古文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的主张。曾国藩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但又有所保留。这比起那班一味主静的理学家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变化。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谈到经世之学。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他要“经”什么邦、“济”什么世呢?这只要把他的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一下,就很清楚了。

曾国藩明确谈“经济”之学,始于1843年,时值鸦片战争后第三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齐袭来,清朝危机四伏,魏源、包世臣等人要求改革

的声音相继响起。关心国事的曾国藩，对此时代的巨变不能不有所感触，注意“经济”之学，正是他关心国事的一种反映。当然，他所要“经”的，是清朝之邦；所要“济”的，是地主阶级之世。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是曾国藩理学的一个时代特点。

讲“经济”，就意味着排斥空疏无用之学。曾国藩不仅明确表示，他对于烦琐的考据之学“吾无取焉”，而且劝自己的弟弟，对那些无用的东西也要看得穿些，即使是对时人孜孜不求的科举考试，也应作如是观。他1844年6月给曾国华的信中说，如不能入洋，“则当尽弃前功，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如果仍然“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搭截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这表明，曾国藩不仅对考据之学，而且对科举考试，也是不满的。日后，曾国藩由儒生而治兵镇压太平天国，由理学家而成为洋务派大官僚，其中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他注重经世之学。

曾国藩虽然崇奉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但他的思想中也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

作为封建社会末代道学家，曾国藩并没有给道学增添多少新鲜内容。他的理学著作，只有《致刘孟容》、《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等寥寥数篇而已；他的理学思想，散见于日记、书札中。因此，他只能算是一个抱残守缺者。他所以被称为末代道学家，一是因为他讲道学，还做些主敬、静坐的“内省”功夫；戊戌时期，叶德辉之流也讲道学，但连曾国藩这

点道学修养也没有了。二是因为，他通过镇压太平军而取得政治地位，使他这个讲道学的人成为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重要的人物。统治者需要这样的人来维护统治，士大夫们也认为应以他作为楷模而取得功名。再加上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比较善于识人、用人，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地主阶级人才群。于是，这位没有系统道学著作的曾国藩，就被捧成了道学家。他也成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二、建团建军

曾国藩踏上仕途的那一年，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遭到失败。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长期闭锁的大门被打开了，中国社会从此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行。

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牵动着无数中国人的神经。广大爱国军民，用血肉之躯与入侵之敌殊死搏斗；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忧国伤时。刚入仕途的曾国藩，虽然没有亲赴前线，但是也密切注视着战争的态势。

从1842到1852的十年中，曾国藩过着安闲的京官生活。他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也无事可做，正象曾国藩给他父亲信上说的，不过是“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况与在翰苑差不多。

他每天诵读诗古文辞，做修身养性的功夫。在北京的四合

院里，他用一卷书、一杯茶、一柱香，消磨一个又一个清晨，一个又一个黄昏。

这个时期，他只在1843年任四川正考官时，离开过京都半年。他在成都，途经诸葛亮坟墓所在的定军山，天险剑门关，写下了感怀古今的诗篇。游历明代诗人杨升庵读书的新都桂湖，那一泓清水勾起他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家乡的思念。

可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引起的深刻变化，蕴酿着、展开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鸦片战争大量的战费支出，战争失败后巨额的赔款，都加在人民头上。五口通商，关税协定，外国商品自由地、日益增多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输入也逐年激增，这一切使得白银哗哗地外流。银贵钱贱，人民用产品卖钱换取白银纳税，又遭受一层剥削。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而官僚地主，更趁火打劫，贪婪地兼并土地；加以连年各种自然灾害，使无数农民离开土地，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越来越活不下去了，只得铤而走险；起来向统治者斗争。

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起义十分频繁。1843，武冈州曾义社阻止米谷外运，聚众起义。1844年，耒阳县杨大鵬等千余人抗粮起义。1847年，道州李魔旺与官军对抗，乾州苗民也抗租起义。影响最大的是斋教首领雷再浩、李世得领导瑶、汉人民，在湖南、广西边境的起义。雷再浩失败，1849年，他的旧部李沅发于湖南、广西边境起义，队伍发展到四五千人，转战十余州县。李沅发击败了曾国藩的同乡至好江忠源的地主武装，抗